

全球化语境中跨国难民文化身份的自我想象

汪 罗

摘 要 全球化语境中，“难民的跨国迁移和流动”成为一个“紧要的问题”。研究以自我想象为着眼点，以“移民大篷车队”(Caravan Migrants)为穿插案例，分析了全球化语境中跨国难民想象自我文化身份的行动逻辑，并援引格根的新“自我”观念对促成跨国难民文化身份自我想象的主体性与能动性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研究建议，重构跨国难民的文化身份，需要厘清“cultural identity”中身份维度与认同维度的张力，更需要明晰全球化与跨国难民文化身份自我想象的互构机制。

关键词 全球化；跨国难民；文化身份；行动逻辑；自我意识

DOI 10.16602/j.gmj.20200015

一、问题的提出

如若将“人口的跨国迁移和流动”视作当今世界最为明显的社会现象之一，估计大多数人都不会有反对意见。同理，如若将这种社会现象的行动主体框定在非法移民、难民、流亡者等边缘群体内，想必也不太会招致许多反对意见，这从当下世界中广泛存在的“难民潮”中便可窥见一斑。缘何如此？全球化似乎理所应当担负起责任，成为理解这类“边缘群体的跨国迁移和流动”的社会语境和知识语境。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信息沟通和交流等方面的联系日益深入，全球化现象开始凸显，成为规设“地球村”中每个个体观念、思想和行动的指南。诚如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全球化：人类的后果》一书中评价的那样，全球化已然成为“一个陈词滥调、一句神奇的口头禅，一把意在打开通向现在与未来一切奥秘的万能钥匙，它既是幸福的源泉，又是悲惨的祸根”(鲍曼，2001，p. 1)。在一些新自由主义者或极端全球主义者所构造的乌托邦世界里，全球化开启了一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时代，市场、资本与权力构成了解决所有症候唯一有效且正确的途径；而以“依附

汪罗：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西藏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

理论”“世界体系”以及“东方学”等为代表的后殖民理论体系则笃定全球化似乎有着“不平等”的原罪,因为它总是与欠(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关联甚密。

全球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简·尼德文·皮特尔斯(2016,p.27)认为,“跨洲或洲与洲之间的古代人口迁移”是全球化的重要内涵之一。萨义德则将视线转向了西方现代社会,认为“现代西方文化的构成主体大都是流亡者、移民和难民文化”(转引自 Philip Mosley,2004,p.18)。可见,难民的跨国迁移和流动现象从古至今普遍存在。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特定的事件和时间节点来标识其历史起源和存有边界,但确实是全球化赋予了其能动性和可见性,使之发展成为一个关键的全球性问题。也正因为如此,难民的跨国迁移和流动总是被当作映射全球化进程与格局的介质而被广泛认知和接受。历史地看,出现在欧洲大陆的“‘一战’后俄国难民”“犹太难民”“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匈牙利难民”“科索沃难民”,出现在亚洲大陆的“日本侨民”“朝鲜战争中的南北难民”“伊拉克难民”“阿富汗难民”“叙利亚难民”,出现在非洲大陆的“索马里难民”“因信仰分裂造成的苏丹难民”“饱受内战之苦的安哥拉难民”,出现在美洲大陆的“‘冷战’时期的古巴难民”“饱受战乱的哥伦比亚难民”“独裁统治下的萨尔多瓦难民”,等等,这些难民的跨国迁移和流动现象都是全球化语境下的产物。

基于此,在本文中,笔者以“移民大篷车队”(Caravan Migrants)为穿插案例,对难民的跨国迁移和流动现象引发的现实反应进行学术反思与学理回应,以期在明晰跨国难民文化身份自我想象的基础上促成这一研究领域新知识的生产。

二、“跨国难民研究”的文献回顾

难民是指那些“基于充分理由,害怕由于种族、宗教、国际、属于某一社会团体的成员或持有某种政治观点等原因受到迫害,而身处原国籍之外并且由于这些畏惧而不能或者不愿意效忠其国家的人;或者任何丧失了国籍并且离开了其先前惯常居住的国家而不能或者由于这些畏惧不愿意再返回其国家的人”(国家宗教事务局政策法规司,2008)。难民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实现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跨越,希望通过空间的迁移和流动,来改变现有的生活空间,继而换取人身财产安全和未来生存的新希望。就跨国难民总体的学术传统而言,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研究者很少关注其跨国性与流动性,更多的是将这种状况解释为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因政治斗争而暂时成型的弱势群体。因此,绝大部分研究成果对此情形的陈述从性质上而言都属于经验性的描述,都是由那些充满道义感和责任感的专业记者和救助人员来完成的。20世纪

80年代以后,随着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与进一步发展,“难民的跨国迁移和流动”行为和现象日趋常态化,研究者逐步意识到多学科介入的必要性,由此,便生发出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就具体的研究视角而言,大致包括:

(1) 哲学视角:按照后殖民理论的观点,难民作为一种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都落后于“自我”的“他者”,其存在的价值是为了更好地确认“自我”的身份地位(萨义德,1999,p.47)。鲍曼将难民和非法移民看作是“冗余人口”,是那些常常处在社会边缘的“废弃的生命”。在他看来,“在全球化带来的不确定性里,难民潮和移民势必将摧毁人类所有的现代性追求”(鲍曼,2006,p.18)。

(2) 政治学视角:难民的跨国迁移和流动现象大都归因于“权力主体间不对等的权力关系”(Westin,1999,p.25),其“产生与走向与不同历史节点中的思想、权力和利益等要素的形塑和组合”(Betts & Loescher,2010,p.12)关联甚密,地缘政治和文化政治亦是其中重要的因素。

(3) 经济学视角:跨国难民大都属于经济难民,他们常常出于某些经济层面的原因,选择逃往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在此之后,他们或可为逃往国家的经济发展注入活力,成为该国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又或对该国经济增长造成威胁,甚至导致宗教、种族、文化等领域的冲突。譬如,宋全成(2007,p.7)在分析欧洲大陆的移民时认为,“西方社会创造的种种‘经济奇迹’”几乎时刻影响着跨国难民的认知和决定。马细在分析欧洲难民危机时指出,大量难民的“侵入”将从根本上导致欧洲国家的经济出现衰退,致使欧洲人的生活质量下降,右翼势力甚至是伊斯兰化等趋势会在欧洲国家大量出现(转引自李凤林,2016,pp.206-207)。

(4) 伦理视角:“难民问题首先表现为一个人道主义问题,它不仅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一个主要道德问题,还能引出谁是道德共同体成员的重要道德问题。”(袁超、张敏,2018,p.129)现实中,每一次跨国难民的迁移和流动都会勾连不同利益主体的神经,而“寻求道德价值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平衡则成为处理难民事件的永恒主题”(张永义,2018,p.95)。

就具体的研究方法而言,大致呈现为“个体—国家/政府—全球系统”三个层面:

(1) 在个体层面:研究主要对准难民的个体经验,综合跨文化适应、跨文化协商、跨文化冲突等理论视角,探讨跨国难民为什么要在某个时刻决定逃离他/她的国家,探究决定跨国难民能否适应新生活(存)环境的核心要素为何。

(2) 在国家/政府层面:着重探讨跨国难民迁移和流动中的国家/政府因素,是目前研究跨国难民最为核心、最为主流的方法之一。已有的研究成果大都聚

焦于阐述导致跨国难民出逃的缘由及跨国难民接受国的难民政策。就前一个问题, Gordenker(1987, p. 62)认为, 造成跨国难民的原因既可以是孤立的, 也可以是互相联系的, 但“每一次难民(潮)的流动中都与国家/政府采取的相应行动有很大关系”。对于跨国难民接受国家的难民政策方面的研究, 多数都集中在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比如李晓岗的《难民政策与美国外交》、罗斯玛丽·塞尔斯的《解析国际迁移与难民政策: 冲突与延续》、张媛的《后危机时代外国移民政策比较研究》等著作。

(3) 在全球系统的层面: 主要探讨国际格局及国际体系的发展与变迁如何影响难民的跨国迁移与流动、国际社会及国际组织对于跨国难民帮扶的实际效用等方面。譬如, 戈登·A. 克雷格和亚历山大·乔治分析了“冷战”时期美跨国难民在迁移和流动中的美苏相互政策的制度性因素(转引自计秋枫、龚洪烈, 2011, p. 406), 迈克尔·巴尼特、玛莎·芬尼莫尔(2009, p. 41)将难民的跨国迁移和流动视作“国家为转嫁社会在变革过程中所产生压力的一种疏导机制和转换机制”。另外, 立足于全球系统的分析也带来了相关的国际法的运用和推广, 促成了以国别和地区为基本研究单位的著述的出产。

就“跨国难民的文化身份”而言, 大多数研究成果集中在文学和戏剧领域, 以经典的文学文本和戏剧文本为分析对象, 阐释作品中跨国难民文化身份的基本样态、制约因素和想象空间等方面的内容。这部分研究成果主要有云玲的《裘帕·拉希莉作品的离散叙事研究》、徐颖果的《美国华裔戏剧研究》、文红霞的《跨文化的女性言说: 当代美国华裔女性书写研究》等。很少有研究成果能够立足于全球化语境, 对难民的跨国迁移和流动中的“身份”及“文化身份”等相关议题进行学术观照。

三、跨国难民的“身份”及“文化身份”何以成为一个紧要问题?

全球化语境下, 很多事物都突破了地理疆域, 带来了如信息、商品、货币、投资、思想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持续不断地流通, 形成一种“去地域化”的趋势。难民的跨国迁移和流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被理解成为一种跨越物理空间/物理边界的文化实践, 也可以被理解成为一种跨越“地域、族群、语言、性别、年龄(代沟)、阶级、宗教”(杜维明, 2001, p. 98)等文化边界的文化实践。文化边界不断突破和跨越的行为本身也意味着跨国难民文化身份的调适、转换甚至是重构, 尽管文化边界与文化身份属于不同的概念范畴, 但二者在构成体系上都将民族、种族、族性、阶级、性别、国家等因素作为依据和尺度, 将二者并置似乎又有了至少在形式上的合理性。在此, 每一种要素, 或者几种要素的组合, 都有可能

成为迁移和流动场景中跨国难民交往与认同的中介,也有可能演变为跨国难民交往与认同的障碍。

对于文化研究而言,身份问题至关重要,“它构成了考察个体与群体自我认识与自我理解的各种语境”(Edgar & Sedgwick, 1999, p. 183)。在难民的跨国迁移和流动中,“身份”与“文化身份”常常会表现出一种兼具身份属性与象征属性的双重意义图式,并且会在具体的迁移和流动过程中被各种要素予以规制,逐渐演变成为全球范围内“人流景观”中角力最为明显、抗争最为突出的表征之一。这首先与充斥在迁移和流动过程中的暴力、流血事件直接关联,与此类事件频繁地见诸媒体并被媒体大肆渲染亦有很大关系,在一般的媒介叙事中,难民的跨国迁移和流动无异于一场“血与泪的征程”。其次,这在很大程度上与“identity”一词在词义和指称方面的暧昧性有关。“identity”一词是现代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领域中的常用术语,其进入中国学术界之后却常常以“身份”和“认同”两种称谓出现。“当‘identity’解释为‘身份’时,它是个体标识自己为其自身的标志,指向的是某种自我认同的同一性,而当其解释为‘认同’的时候,即表示对共同的或相同的东西进行进一步的确认”,身份与认同是“identity”整体结构的一体两面,“身份的确立必须在自我与某一外在的标示之间建立依附关系;而认同的结果则强化了某一主体区别于他性的身份”(陈庆祝, 2009, p. 146)。在一定意义上,人的身份先于人的存在,就如同文化人类学中“文明—野蛮”二元论笃定的那般:通过划定野蛮人的身份,之后再对野蛮人身份中的种种事实性元素如语言系统、认知结构、行为模式等存在表征进行象征性包围和歼灭,以此来彰显“文明人”在身份属性与存在属性中的优越性。

文化身份的研究起点来自于认识(想象)“自我”,即对“我(们)是谁?”的问题进行哲学层面的追问,它是“自我”的身份维度中意义指涉最为丰富的概念。斯图亚特·霍尔将文化身份界定为“‘一种共有的文化’、集体的‘一个真正的自我’,它反映了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提供了变幻的历史经验之下稳定不断且具有连贯性的意义框架”(霍尔、杜盖伊, 2010, p. 13)。从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论及的“历史和地理的想象”开始,再到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对于“家园的追寻和对身份的想象”,无不验证着文化身份在认识(想象)自我的过程中成型的、稳定且具有连贯性的意义框架。现实中,自我可以根据其主体意识在空间流动与情境变化的前提下对其“身份”及“文化身份”做出调适与选择。譬如,持此观点的布尔迪厄就充分肯定了自我的主体性,“自我赋予了人一种特殊的权力,使人能够毫无限制地改变自己的身份,或者通过改变其打算同化或排斥对手或合作者所属阶层的界限来改变他们的文化身份”(转引自高宣扬, 2005, p. 176)。与此相对应,后殖民主义理论则将文化身份的探讨延伸至“他者建构”之维,认为身份是被建构的,个体(群

体)文化身份的稳定性是一种本质主义的幻象,文化身份并非一成不变,具有极度的混杂性。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真正到来,难民的跨国迁移和流动仍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并且呈现继续扩大和加剧的趋势。此时,信息传播技术(ICTs)更迭换代,电子媒介逐步替代印刷媒介,文化边界中那些区隔身份边界的相对固定的成分似乎都已经消散不见,一切新建立的关系甚至尚未成型和稳定就已被击碎。正如莫利(2001,p. 117)所描述的那样,“现代环境和现代体验切断了所有地理的和种族特性的界线、阶级和国籍的界线、宗教和意识形态的界线”,如此一来,既有学术研究中那些以“地理范畴中的东方与西方、现代性视野内的民族与国家、跨文化语境中的宗教及其认同、多重形态的地域”等作为区隔跨国难民文化身份的标识,以“他者建构”作为绝对主导逻辑阐释跨国难民文化身份而进行的学术研究似乎很难再贡献新的知识生产。

四、跨国难民文化身份自我想象的行动逻辑及其自我意识

在过去的岁月里,世界格局一直处在动荡之中,大大小小的战争以及来自不同国家/种族之间的冲突和暴力事件难以准确计量,这直接导致了数以千万计的难民选择以“逃离本国”的方式去追寻他们渴望的新生活。联合国难民署发布的《2017年流离失所问题全球趋势》中显示,“由于非洲和中东地区的战争、贫穷、暴力等因素,全球难民人数连续5年保持增长,目前已达到6850万人。其中,2017年新增被迫害人数1620万人……海外流亡的难民达2540万人”(荔枝网,2018年6月19日)。而在2018年,世界局势仍然极度不稳定,局部地区的宗教冲突、种族冲突、意识形态冲突等全球性问题仍在不断上演,全球难民尤其是海外流亡的难民人数将有继续上涨的可能性。凡此种种,都为思考跨国难民文化身份的自我想象提供了很好的现实注脚。

约翰·汤姆林森(2002,p. 2)将全球化视作一种“复杂的联结”,他认为,“相互联系和互相依存构成了现代社会生活的特征,而全球化指的就是快速发展、不断密集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网络关系”。传统意义上的时空构成大都以特定“地方”中的某个族群及其日常生活方式为内涵,与个体文化身份的自我想象维度保持着同一性,而现代性意义上的时空构成则解构着传统时空中“地方”的指向与内涵。首先,全球化带来的去地域化作用使得“全球”演变为格局单一的“地方”,成为个体文化身份自我想象的新参照框架,它使得跨国难民的文化身份愈加脱离了原有的地方语境,创构了一种文化身份自我想象的新场景。与此同时,全球化的自反性特征也牵引着跨国难民时刻思虑那些能够规制文化身

份自我想象的要素,认清自身在新场景中所处的境遇与位置。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对于跨国难民文化身份的自我想象,还在于它极为彻底地改变了身份想象的先决条件。首先,全球化使得跨国难民的社会关系跨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全球化正变革着跨国难民先前所处公共领域的稳定结构,形成了一种新的竞合机制和权力关系。其次,全球化致使跨国难民延伸了自身已有的社会关系,使其脱离了原先的文化圈层,进入了新的文化场景,跨国难民因此成为多种文化杂糅与汇聚的载体。由此,吉登斯(1998, pp. 80-81)立足于全球化语境,对于个体在新文化场景中的角色及命运发问,“该做什么?如何行动?成为谁?对于每个人都是核心的问题,在任何水平上,无论是话语性的还是通过日常的社会行为,它们都是我们所要回答的问题”,这种发问值得我们反复思量。

吉登斯的发问映射到现实社会中,可以经由跨国难民想象文化身份的行动逻辑来理解:现实中,跨国难民文化身份的自我想象是以“空间的迁移和流动”为表征,经由“逃亡”和“抵达”等运作机制来实现的。在此,“逃离本国”构成了他们跨国迁移和流动的行动起点,也是他们想象自身文化身份的行动起点,而“抵达他国”,实现“抵达之后文化身份的变革、调适与转换”则是跨国难民想象自身文化身份的行动终点。在2018年间,来自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危地马拉等中美洲北三角国家的7000余名非法移民组成的“移民大篷车队”(Caravan Migrants)就是近些年难民的跨国迁移和流动的典型事例。“移民大篷车队”的成员意图“逃离本国”,经由墨西哥,踏上去往美国的征程。他们不想再忍受低下的收入和日常生活中的暴力泛滥、战争频发、毒品遍地,意图去美国追寻新的身份、开启新的生活,尽管形势严峻,途中更是遭遇了来自美国政府和墨西哥政府的多种形式阻挠,但他们仍然笃定“只有上帝才能阻止我们”。可以看出,“移民大篷车队”成员行动逻辑的起点及文化身份自我想象的起点是“逃离本国”,“去往美国”;而“抵达美国,并尽可能地成为名副其实的‘美国人’”则是“移民大篷车队”中跨国难民行动逻辑的终点和文化身份自我想象的终点。

社会空间理论认为,当社会关系作用于空间,并在空间中进行话语(如媒介话语、意识形态话语、政治话语等)表述的时候,跨国难民在新文化场景中的文化关系才能够得以存在并被界定下来。在这样的情况下,跨国难民的文化身份被固化地投射到混杂且不平等的异域空间中。在新的地理空间尤其是新的文化空间里,跨国难民文化身份的自我想象会被各种合理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所制约和限定,因为此时的空间远非一个与政治话语和意识形态话语保持距离的客观存在,而是一个被各种自然的、历史的要素所构造,政治和意识形态占据主要地位的空间(包亚明,2003, p. 52)。与此同时,跨国难民的惯例和习俗亦不断地被制度性解构,又不断地被制度性区分与重组,使其成为跨国难民终其一

生进行的“反思性工程”。在吉登斯(1998, pp. 58-59)看来,(文化)身份的自我想象“并不是个体所拥有的单一特质,或一类特质的组合,它是个体依据其自身经历形成的,作为反思性理解的自我……在转换的场景中运用‘主我’以及每个已知文化的特质的能力”。换言之,自我想象的过程涉及跨国难民对新文化场景的要素调整与适应,以及对自身在此过程中所持认知与所践行为的反思,是一种对新“自我”观念的想象。

社会建构论心理学家科尼斯·格根将“自我”观念划分为浪漫时期、现代时期和后现代时期三个阶段。他认为,在19世纪以前的浪漫时期,个体始终坚信自我具备稳定的结构,个体在世存有的目的、介质、关系都较为单一和固定。个体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对自身的言行举止高度负责。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体的“自我”观念开始转向现代时期,在此阶段,个体对自我的认知转变为受理性支配的、机械的观点,个体成为极力克制自身的情感和激情,成为信仰理性和道德而存在的人。而在20世纪晚期,随着全球化浪潮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个体的自我观念发生了新的变化,进入了后现代时期。在此阶段,个体逐步摒弃稳定结构和受理性、道德支配的信念,转而认可一种由规制“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技术装置”(比如手机、PC、互联网等)形塑而成的“关系化的自我”。这种关系化的模型使得个体间在线交流日渐频繁,在场交流日渐式微。在格根(2017, p. 129)看来,“新的技术装置使多种不同的声音输入我们的大脑,既有和谐的,也存在另类的。当我们把这些不同的声音吸纳进入我们的大脑之后,它们是我们的存在的一部分,我们也是它们存在的一部分”。在这种互为依存的机制中间,自我超越了浪漫时期、现代时期的“有界存在”形态,逐步演变成为一种“无界存在”的行为主体:“我们都会成为某个人(become somebody),在特定的文化场景中,扮演某个特定的角色,或者采用某种特定的身份”(格根,2017, p. 149)去实现其特定的目标。“关系化的自我”观念及“无界存在”的势能催生出了跨国难民借助于技术装置来强调和确认其文化身份自我想象的能动性与主体性,它是跨国难民对长久以来文化身份被压制、被边缘、被规训生存状态的一种反拨。这种“反拨结构”的内在张力,大都动态地存在于异质文化与同质文化的博弈与竞合之间。与此同时,这样的“反拨结构”中也常常存在着明确且森严的主(客)体等级,使得跨国难民的文化身份长久性地处在“自我想象”与“他者建构”的撕扯之中。在列斐伏尔看来,“(社会)空间就是(社会)产品”(转引自包亚明,2003, p. 48),他否定了空间存在静态的社会关系,而是将其视作社会关系建构下,且裹挟了特定目的动态性产物。在此情况下,空间演变成了权力的竞逐和实践场域。尤其是当跨国难民进入新的地理空间之后,他们作为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势必招致非议并受到强烈排斥,那些自我想象向度中的能动性和主体性因素就会受到限制和挤压,并被“他者建构”的逻辑任意规设和宰制。在一个

被新的权力体系把控操纵的文化场景中，跨国难民文化身份的自我想象是完全被动的，他们难以对新权力空间中的文化要素加以归类和排列，更不能使其为自身效劳和服务。尽管跨国难民跨越了实在的地域（地理）疆界，有时也可能冲破着民族与国家的边界，但跨越后“新的空间”在本质上与“旧的空间”相差无几，或许现实中些许的斗争、冲突甚至是流血才有可能产生些许波澜。

在“移民大篷车队”的行动逻辑中，中美洲北三角国家的难民之所以选择跨国流亡，大多数归因于本国不稳定的政治形势和缺乏温饱的日常生活。但是，跨国难民趋之若鹜的“美国因素”却是造就他们文化身份自我想象的“起点之起点”。历史地看，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等中美洲国家一直都是美国境内非法移民的主要来源国，据统计资料显示，2000年至2012年间，来自上述三个国家的非法移民“从88万上升至161万余人次”（Baker & Rytina, 2012）。在2012年之后，中美洲北三角地区的形势依旧严峻，经济发展、财政收支、政治统治和社会结构等方面的脆弱性致使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地区的发展更加成为难题。在不同历史时期，中美洲难民潮有着较为明确的发生语境，但总体而言，无外乎中美洲北三角地区历史变迁中的“殖民传统”以及美国在其中的种种作为。林恩·福斯特（2016, p. 346）在《中美洲史》中认为，“中美洲北三角地区的发展是美国政策的副产品”。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在中美洲北三角国家和地区发起的“反暴动运动”（Counterinsurgency Campaigns），在不甄别和认定“身份”的前提下，对平民、妇女和儿童等弱势群体大肆打击和攻击，造成了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地区难民潮源源不断地进入美国情形的产生。而在2006年签订并生效的《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更是让原本情况稍稍安逸的劳工也搭上了难民潮的列车，开始跨国的迁移、流动甚至是逃亡。此后，美国又相继以打击军事主义和暴力主义为由，继续在中美洲北三角地区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和贸易政策，让数以百万计的劳工流离失所，也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难民潮涌进美国的趋势。“移民大篷车队”的兴起、发展及遭遇的困境与上述语境保持着逻辑的统一性，同时又与特朗普政府在美洲地区推行的强硬移民政策关联甚密。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和围堵策略给“移民大篷车队”赋予了更多的戏剧性和不确定性，也让成千上万跨国难民的身份归属，尤其是文化身份的自我想象更加扑朔迷离。

五、结语：重构跨国难民的文化身份

跨国难民对其文化身份的自我想象是一个关涉政治、权力及意识形态多重因素的研究议题，其复杂性绝非本文可以涵盖。作为一个未竟的研究过程，难民的跨国迁移和流动的“cultural identity”中的身份之维与认同之维饱含张力，

“自我想象”与“他者建构”之间的撕扯与矛盾更是难以调和,重构跨国难民的文化身份势在必行。

重构跨国难民的文化身份需要回到“cultural identity”本身,让身份的回归身份、认同的回归认同。身份与认同的区别在于,身份指向个体及个体性,而认同则是对集体及集体性的一种描述。由身份牵引出的诸如“我是谁?”“我们是谁?”等相关问题之所以作为个体无法挣脱的先决条件,就在于个体的社会属性与传播属性。“人不能不传播”,这是构成传播研究的逻辑起点,也是个体无法独自承担长久的孤寂而必须进行群体性、社会性交往与互助的中介。因此,身份虽然生发于个体及个体性,但最终会在群体性交往、协作与互助中达致(身份)认同的层次。对于文化身份而言,身份维度与认同维度始终存在于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学术史脉络之中。譬如,从早期文化人类学话语体系中的“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再到后殖民理论体系中的“东方与西方”“自我与他者”“中心与边缘”等理念,既映射着不同主体间的身份格局、身份等级与身份秩序,也在很大程度上彰显着认同的结构性差异。

相对于其他身份属性,跨国难民文化身份的构成更为复杂、指涉更为隐晦,尤其需要研究者对其进行知识考古,以厘清其逻辑缘起及价值意蕴。在斯图亚特·霍尔看来,“文化身份是有源头的、有历史的,它是在我们过去的叙事中给自身规定了位置”(转引自罗钢、刘象愚,2000,p.211)。结合全球化的演进态势,我们可以将霍尔所言之“文化身份作为过去的叙事”拆解为前全球化与全球化两个时代。在前全球化时代,相对封闭的社会状态直接导致了跨国难民身份结构与认同结构的相对固定性,跨国难民的“自我”身份与属性能够在一定的地理与文化场景中被轻易地识别与认定。在这种社会形态中,不同文化间的接触、交往与互动大都是一种偶然或者是不常见的现象,能够为跨国难民(身份)认同提供参照的“他者”几乎不存在。因为在全球化没有滥觞之前,人们并不刻意去探讨“认同”及“同一性”,并非由于当时人们不具备此种自觉意识,而是“由于那时人们觉得‘认同’及‘同一性’根本不成问题,不必如此小题大做”(泰勒,2001,p.48)。世易时移,全球化时代的全面莅临终结了传统社会原有的运作机制与基础结构,让跨国难民原本的交往方式与生活(存)方式都有了巨大改变,来自异质文化空间中的强势“他者”为跨国难民身份及认同的边界提供了一种区隔的机制。因此,将跨国难民的迁移和流动现象置于“cultural identity”的本体论视野之中,让身份与认同各归其位、各行其道,不仅能够建立起跨国难民文化身份的缘起逻辑、实践面向、形塑机制、价值诉求等诸多层面的内容,使其成为一个完备的解释规则;还能够在相当程度上确立跨国难民文化身份自我想象结构中的具体位置。举例来讲,所谓的美国的、英国的,先进的、落后的……,各种文化身份在实质上仅仅是彰显了“identity”的“身份”维度,而在“认同”维度却

始终未曾抵达,是一种正在进行的/未完成的文化身份/文化认同的建构与想象。只有充分认识到跨国难民文化身份自我想象的动态发展性,才能够清晰地认识到跨国难民在迁移和流动的过程中与不同文化空间、不同文化主体间的对话机制和竞合机制,实现由自我想象到自我认同的蜕变。尽管跨国难民的文化身份有其历史和来源,但由于全球化语境下的日常生活超越了时间、地方、文化和历史等特点,文化身份的自我想象势必经历持续性的变革,兼具生成与实在的双重性质。

重构跨国难民的文化身份,需要厘清跨国难民的文化身份与全球化的互构机制与逻辑,这其中主要涉及两个关键。

首先是“全球化建构跨国难民的文化身份”的问题。前文提及,全球化内裹的不平等性既是难民跨国迁移和流动兴起与发展的知识语境与社会语境,更是其导致的必然结果,但这似乎又成了一种经不起推敲的、简单的因果决定论。在全球化时代,难民的跨国迁移和流动就好似一面镜子,能够部分地反映出了世界全球化格局的真实状况,但总有些触角是通过观察和描述提炼不出来的,我们需要对全球化语境进行深刻认识和深刻反思,摒弃简单的因果决定论以及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思维,充分认识到全球化语境与跨国难民文化身份同构性的复杂肌理。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互构的过程,全球化可以同时囊括多元文化的冲突、交融等情形,对跨国难民的文化身份相关的一系列问题的解释和理解要超越本质主义的窠臼,动态地、辩证地考量全球化语境下难民的跨国迁移和流动中不同规则、不同规范的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内在联系和内在张力。

其次,重构跨国难民的文化身份,还应辨析跨国难民文化身份的生成与发展之于全球化的能动性影响。随着全球化的加剧,跨国难民日趋频繁的迁移与流动实践消解着静置的地理政治以及“在地”个体的身份政治,让“在地”成为他性场所。按照一般的逻辑,全球化“霸权话语”的实现,势必要以解构在地场所的“地方性”为前提,但在现实中,归因于跨国难民文化身份的自我想象中存在着极为复杂的“意义结构”,其旨归并不在于跨国难民个性的泯灭,而在于让跨国难民在多元文化际遇中实现与新文化场景的共生共存,“全球化”与“地方性”此消彼长的局面因而被打破。以此为前提,难民的跨国迁移与流动不仅将“另类的全球化”的学术命题推向前沿地带,更在根本上影响着难民接收国的难民政策及其治理模式。“现行的全球化是以国际贸易组织的‘合法性’程序,强制性地推行于全世界的单一性全球化模式”(转引自张立升,2005,p.35),“另类的全球化”试图变革此中单一逻辑,为全球化语境中更多的边缘群体开辟更为多样的选择模式。按照埃德加·莫兰的理解,全球化体系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维度,“一个为纯粹经济和技术的,基于利润(profit)之上;另一个则正在为全球公民身份做准备,生产一种将地球作为国家的归属意识,这种经由社会运动孕育

的归属意识将地球彻底开化为一个“全球社会”(转引自朱振明,2013,p.203)。在“另类的全球化”时代中,“信息”的登堂入室,如同贵金属和货币一般,成为比物质更为要紧、更珍贵的社会资源,这为难民接收国制定难民政策、探究难民治理模式带来了机遇与挑战,也在很大程度上赋权于跨国难民群体,强化了其行动力与想象力的能动性:一方面,跨国难民可以根据不断变动的信息来消除自身行动及自我想象中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难民接收国亦可借用不断变动的信息来强化难民接收、难民治理中的确定性。

本文系西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专项基金项目“基于话语分析视角的日本主流媒体涉藏报道研究(1951—2018)”(19CYY03)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 爱德华·W·萨义德(1999):《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安东尼·吉登斯(1998):《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赵旭东、方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包亚明(编)(2003):《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查尔斯·泰勒(2001):《现代性之隐忧》(程炼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 陈庆祝(2009):《九十年代中国文论转型:接受研究的视角》,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 戴维·莫利(2001):《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司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单德兴(2013):《论萨义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 杜维明(2001):《东亚价值与多元现代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高宣扬(2005):《当代社会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国家宗教事务局政策法规司(2008):《国际文书有关宗教条款汇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 计秋枫、龚洪烈(2011):《国际关系史研究导引》,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简·尼德文·皮特尔斯(2016):《全球化与文化:全球混融》(王瑜琨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 肯尼斯·J·格根(2017):《关系性存在:超越自我与共同体》(杨莉萍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李凤林(编)(2016):《欧亚发展研究(2016版)》,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 荔枝网(2018年6月19日):2017年流离失所问题全球趋势,获取自<http://v.jstv.com/a/20180619/1529398921827.shtml>。
- 林恩·福斯特(2016):《中美洲史》(张森根、陈会丽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 罗钢、刘象愚(主编)(2000):《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迈克尔·巴尼特、玛莎·芬尼莫尔(2009):《为世界定规则:全球政治中的国际组织》(薄燕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齐格蒙特·鲍曼(2001):《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徐建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齐格蒙特·鲍曼(2006):《废弃的生命》(谷蕾、胡欣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 斯图亚特·霍尔、保罗·杜盖伊(2010):《文化身份问题研究》(庞璃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 宋全成(2007):《欧洲移民研究:20世纪的欧洲移民进程与欧洲移民问题化》,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 袁超、张敏(2018):难民问题的伦理反思,《伦理学研究》,第6期,129-133页。
- 约翰·汤姆林森(2002):《全球化与文化》(郭英剑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张立升(编)(2005):《社会学家茶座》,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 张永义(2018):移民与国际伦理:基于世界主义视角的探究,《中州学刊》,第40卷第11期,92-97页。
- 朱振明(2013):《理解国际传播:问题、视角和阐释》,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 Baker, B. & Rytina, N. (2012). *Estimates of the Unauthorized Immigrant Population Resid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January 2012*. Washington: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Retrieved from: <https://www.dhs.gov/immigration-statistics/population-estimates/unauthorized-resident>
- Betts, A. & Loescher, G. (Eds.) (2010). *Refuge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dgar, A. & Sedgwick, P. (1999). *Key concepts in cultural the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Gordenker, L. (1987). *Refuge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 & Sydney: Croom Helm.
- Westin, C. (1999). Regional analysis of refugee movements: Origins and response. In Ager, A. (Ed.). *Refugees: Perspectives on the Experience of Forced Migr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Printer.

Self-imagination of Transnational-refugee Cultural Identity in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Luo Wa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Xizang Minzu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Refugee’s Transnational Immigrations &

Movements” has become one “Critical Issue”. By focusing on the self-imagination upon transnational-refugee cultural identity, as well as taking “Caravan Migrants” as interspersed case,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action logic behind such self-imagination in the globalization, as well as further discussed a variety of problems related to the subjectivity and motility of such self-imagination caused by citing Gergen’s “New Self” concept. The research proposed that the re-construction of transnational-refugee cultural identity needs to clarify the tension between identity dimension and identification dimension in “Cultural Identity”, as well as make clear of the mutual-construc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globalization and the self-imagination around the existing transnational-refugee cultural identity.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Transnational Refugee; Cultural Identity; Action Logic; Self-Consciousness

(编辑:卢 嘉)